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

韩民春, 汪文娟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 在世界贸易额不断加大的同时, 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 由此引起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广泛研究。本文比较和综述了当今学术界对贸易和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 其中涉及贸易的环境效应、环境措施对贸易的影响、贸易与环境冲突的解决等。通过比较发现, 贸易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 环境对贸易的影响也并不显著。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合适的政策平衡来协调好二者的关系, 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国际贸易; 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在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的同时,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正引起全球范围内保护环境的呼声。据统计, 到 1992 年时国际贸易额就已经是二战前贸易额的 50 余倍, 贸易的发展给各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但是, 另一方面带来的却是环境的急剧恶化, 这时人们开始广泛关注环境与贸易协调发展的问题。曾经被西方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视为“低政治”(low-politics)的贸易、环境问题, 逐渐上升到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高政治”(high-politics), 如外交、国防安全等相当的地位。环境问题的提出向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质疑, 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与贸易和环境有关的讨论。目前, 学术界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 2. 环保措施对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3.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冲突与协调。本文将就以上所涉及的几个方面理论和实证分析进行比较研究。

一、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起源及其理论发展

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争论, 曾经出现过两次浪潮。两次浪潮中人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对贸易理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虽然这些理论还存在缺陷, 但为今后相关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 第一次研究浪潮

第一次研究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与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相关的国内和地区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严格的环境政策和高的环境标准, 并寻求环境补贴和保护措施以抵消高标准带来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影响。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环境污染的成因及其解决方法上。

(1) 环境污染的成因

经济学对环境污染成因的分析通常借助外部性理论, 并认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不过是不完全市场的一种经典案例(阿罗, 1969)。贸易不会直接产生环境问题, 只是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政策相配合, 贸易可能加剧市场失灵, 从而加剧环境的恶化。

哈丁 (Hardin, 1968) 在 1968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公地的悲剧》首先引起了人们对公共物品和环境问题产生机制的讨论。不同的学派给予了不同的解释: 按照马歇尔 (A. Marshall) 和庇古 (A. C. Pigou) 的观点, 环境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效应, 由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 私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使得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超过社会最优的排放量, 导致了污染的产生。以科斯 (Couse, 1960) 为代表的产权学派的观点则更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科斯认为,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环境产权归属不清或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从而无法激励人们从事环保行动。如果按照奥尔森 (Olson, 1965) 集体行动逻辑观点, 环境消费的不可分性产生了“搭便车”现象, 使得人们没有动机去自愿保护环境。

以上不同的解释是从公共物品不同特征的角度去考虑的。概括起来, 由于环境产品的公共物品特性, 其产权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外部性的发生, 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2) 环境问题的解决

对环境实质的不同分析产生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不同思路。按照庇古外部性的理论, 解决环境问题, 即是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庇古认为, 政府应当充当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调解人, 对造成正外部性的活动者给以补贴, 而对造成负外部性的活动者予以课税 (庇古税), 并且补贴或课税的数额应当与外部性数额等值。在经济学里, 这个过程称为“外部性的内部化”。单纯从外部性内部化的角度看, 庇古税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但由于衡量社会成本的制度框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使得它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另外, 由于需要政府出面干预, 很难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 如果没有对外部性有充分的认识, 可能会对经济活动造成扭曲。

科斯认为, 假如产权归属明晰, 即使政府不干预, 通过市场调节也能解决环境外部性的问题。科斯强调产权以及排污者——受害者之间讨价还价机制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 在资源或环境产权明晰的前提下, 应当由排污者和受害者谈判, 通过补偿或贿赂来自行解决污染问题。科斯理论有着优越于庇古税的地方。首先, 内部化借助市场的力量, 排除了外来因素的干扰。其次, 交易者由于直接与利益挂钩, 使得最终的平衡点更加接近实际, 这比由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出面可能更好。

2. 第二次研究浪潮

第二次研究浪潮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第一次浪潮相比, 这次更多地具有全球性倾向。这是因为许多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跨境转移的性质, 如臭氧层破坏, 全球气候变暖等。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也使环境问题更多地具有全球性的特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更加密切, 矛盾也更加突出了。关于贸易与环境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更让我们关注的是环境因素的提出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影响。

一直以来, 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简称 H—O 理论) 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论始终占据着西方贸易理论的主导地位, 是各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从事专业化分工的理论依据。然而, 它并没有考虑环境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标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环境问题的提出, 会影响到传统贸易理论的适用性么?

Petheg (1975) 在没有环境政策的条件下首先将具有稀缺性的环境因素纳入了 H—O 模型。他认为, 如果将环境要素作为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一个生产要素, 环境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将出口环境密集型产品或污染品。而环境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将出口非环境密集型产品或清洁产品。这无疑是对 H—O 理论的推广与延伸。

与环境要素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环境保护政策的介入。Siebert (1990) 对此做了研究。假定国家甲环境资源相对于乙国丰富, 环境政策的介入会提高甲国原本比较低的环境影子价格, 从而使得两国影子价格的高低变得不明确。如果甲国影子价格由低于乙国变为高于乙国,

则环境政策使得在环境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就从甲国转向了乙国,直接导致了两国贸易模式的改变,此时,甲国将出口非环境密集型产品,而乙国将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

总之,环境问题的提出并没有推翻传统的贸易理论,而是将原有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扩充。在当今贸易与环境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将环境因素作为要素禀赋纳入到贸易模型中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扩展的模型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环境因素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模式、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竞争力,是否带来了跨国界污染转移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给出了他们的研究结论。

二、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贸易与环境关系的一个基本内容。随着问题的不断深入,围绕该问题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 贸易有害论

以 Khor.M,Talor.A 为代表的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对环境保护有消极影响。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剧”可谓是环保主义者观点最有力的实证。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和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等以罗马俱乐部为思想库,在 1972 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增长论”。他们预测,如果经济增长持续下去,天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将面临耗竭的危险。如果污染得不到控制,环境将难以承受重负,除非人类的经济活动受到约束,短期内经济增长和环境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零增长论”的基础上,又有的学者提出了“环境保护第一主义”、“人类返回到大自然里去”等主张。

贸易有害论持有者普遍认为,在缺乏有效环境保护政策的情况下,贸易活动促进了生产和消费的非持续性增长,通过不断扩大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以及污染贸易品的运输,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另外,在当前各国环境标准不同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会赋予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以竞争优势。其结果,就会在这些国家中出现“污染庇护所”(pollution haven)和各国竞相降低环境标准(race to the bottom)的竞赛,从而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2. 贸易有益论

自由贸易主义者(如 Anderson.k, Blackhurst.R, Williams. M)认为,贸易不是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自由贸易不但与环境不冲突,还可以促进环境保护。他们提出了“经济发展决定论”,认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有助于实现环境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从而保证生产活动能够按照最有效的方式进行(Matthew A.Cole,1999)。自由贸易通过提高收入使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和技术来改善环境,还有助于增加有利于环保的清洁产品、服务和技术的交换。另外,贸易自由化还有利于消除那些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如补贴和税收等,而这些措施都被证明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Hector Rogelio Torres,1999)。

环保主义者和自由贸易主义者对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往往都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前者集中批判了贸易的负效应,忽视了贸易带来的福利增加和环境改善。而后者则集中强调了贸易带来的福利和效率上的提高。自由贸易主义者与环保主义者之间观点的对立,反映的深层次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对立。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措施和高的环境标准,很容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幌子,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要维护在贸易中的既得利益和日趋衰弱的夕阳产业;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要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保护环境,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3. 复杂关系论

这也是目前主流的经济观点,认为贸易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学者们大都借助于 Grossman 和 Krueger(1991)对 NAFTA 的环境效应的研究,把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三部分:结构效应 (composition effect)、规模效应 (scale effect) 和技术效应 (technique effect)。

结构效应产生于贸易活动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贸易使一国扩张其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规模。对一国的环境来说,如果扩大的出口部门的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规模缩小的进口竞争部门,则该国的结构效应就是正的,反之则是负的。因此贸易的结构效应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规模效应是指自由贸易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规模。规模的增长一方面意味着受益的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环境污染的增加。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贸易的发展对环境的规模效应是负的,如果存在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剧贸易负的规模效应。

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技术效应是指,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贸易引致的清洁技术扩散以及各国实施的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使得生产单位产品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下降,促使环境改善。所以技术效应一般认为是正的。

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复杂性在于这种影响是三种效应之和,而不是单独某一种效应。三种效应的影响此消彼长,引起了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Copeland 和 Taylor(1994,1997)利用了南-北模型对贸易的结构、规模和技术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如果对清洁环境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从理论上讲,正的技术效应可以抵消负的规模效应。由于对于北方国家来说,结构效应为正,因此贸易减轻了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而在南方国家中,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超过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从而贸易加剧了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而由于污染产业集中在环境标准低的南方国家,世界整体污染将加剧。通过类似的研究方法,他们又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平衡的贸易增长不会增加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

Beghin(1995,2002)的研究证实了贸易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他对墨西哥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墨西哥单边贸易开放引起的结构效应会使其生产结构向清洁产业调整,但规模效应的支配作用最终使污染加剧。Beghin(2002)对智利问题研究表明智利的单边贸易政策会因为进口大量廉价的能源而导致环境恶化。

Copeland 和 Talor(1995)通过研究 CO₂ 排放问题把假设扩展到了环境污染的全球性。他们通过对排放许可证的交易制度的研究得到了贸易发展将会导致更多污染排放的结论。

Chichilnisky(1994)同样得出了贸易自由化加剧环境污染的结论。他认为,在私人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环境资源的破坏,从而对全球环境构成进一步的威胁。

得到贸易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结论的还有 Daly、Goodland、Ayres 和 Ekins 等。Daly, Goodland(1994)和 Ayres(1996)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提出了置疑,认为这种贸易增长不但不是改进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而且与环境保护目标背道而驰。Ekins(1994)认为,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 and 消费对环境有负的影响,那么,贸易自由化引起该商品产出的增加会加剧环境污染,此外贸易流动的增加还将加剧与之有关的运输的外部性。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Anderson, Blackhurst(1992)和 Gorden(1997)认为贸易自由化配合有效的环境政策可以改进全球福利。Stevens(1993)也从贸易的三种环境效应入手,肯定了结构和技术效应的作用,认为贸易活动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相反自由

贸易可以加大对环境保护资金的投入，提高技术水平以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Bhagwati(1993)**, **Selden** 和 **Song(1994)**以及 **Dean(1997)**进一步分析了贸易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指出，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积极作用将最终超过规模效应的负面影响。**Runge(1993)**把贸易的环境效应分为五个方面,论证了贸易自由化在造成污染的同时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的产出结构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反过来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Antweiler, Copeland** 和 **Taylor(1998)**对国际贸易与地面 SO_2 浓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总的污染排放数量应该是下降的。

类似地，**Lee** 和 **Roland-Holst** 利用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三个地区的模拟模型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表明：如果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伴以更加严格的环境管制，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增加除了用来消除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外，还能带来净的经济收益。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 **Strutt and Anderson(2000)**,**Dean(2000)**等。

贸易环境效应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的争论上。**Grossman** 和 **Krueger(1991)**,**Shafik** 和 **Bandy Dpadhyay(1992)**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到了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倒“U”型的关系，指出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环境污染随收入提高而加剧，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受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经济结构向清洁产品调整以及污染治理活动规模效应递增 (**Andreoni,Levinson, 1998**) 的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将伴随着环境状况的改善。但倒“U”型的污染曲线在落后国家却不一定成立，贸易使污染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重新配置，结构效应使发达国家更容易越过 EKC 的顶点而使发展中国家越过 EKC 的顶点更加困难 (**Suri,Chapman, 1998**)。

另外，由于“搭便车”现象，全球化的环境污染如 CO_2 排放问题，也并不满足倒“U”型的假设，全球化的污染问题更需要通过一种全球合作的机制来解决。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污染曲线并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自动下降。**Torras** 和 **Boyce** 在研究中指出，EKC 更依赖与体制和民主改革而非人均收入。同时我们也不应夸大贸易的结构效应。**Bruyn(1997)**对 1980 年到 1990 年间东德和荷兰的工业生产活动 SO_2 排放减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较高的环境税收和严厉的环境管制导致的技术革新而非贸易活动才是环境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以贸易的三个环境效应的角度还是以 EKC 的角度来分析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似乎都没有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这不仅是因为分析框架，数据模型以及实际分析对象的不同原因，更体现了贸易环境效应的复杂性。但大多数学者都趋向于认为贸易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纯粹贸易的增长至少不会带来环境的恶化。如果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伴以更严厉的环境管制，我们是可以找到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道路的。

三、环保措施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和贸易的影响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对贸易的影响。环保措施波及到与贸易有关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专业化分工、产业转移、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等诸多领域。同时受到非经济因素如国际政治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使得环保措施对贸易的影响更加复杂。

1.环保措施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理论研究

对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认识，国际学术界上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观点。悲观派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环保措施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成本，迫使企业增加投资 (**Pashigan,1984**)，从而导致产出和利润的降低 (**Christiansen and Haveman,1981**;**Siegel and Johnson,1993**)；加大了工艺流程的复杂度使得管理难度和费用增加 (**Brock and Evans,1986**)；分散管理者的精力，影响对其他事务尤其是公司战略和长远发展等方面的关注 (**Walley and Whitehead,1996**)；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会阻碍企业

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Rhoades,1985)。总之, 悲观派认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增加了企业成本, 形成了新的约束, 从而降低了竞争力。

乐观派从管理学的角度动态地分析了环境保护对竞争力的积极影响。代表人物为 Porter 和 Linde (1995)。按照波特理论, 严格的环境措施等同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有利于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环境保护可以促使企业将废物转化为可出售的产品从而获得废物利用的额外收益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6)。环境保护还有利于降低生产的“X”非效率的影响或实现生产的 X 效率 (Porter,1991;Altman,1997), 同时还能使企业获得一系列竞争优势 (Slater and Angel,2000), 如创新优势、效率优势、先行优势和整合优势。乐观派还认为, 环境保护具有“双赢效应”(win-win effects), 实施环境保护可以获得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受益。(Gobel and Sinclair-Desgagne, 1998)。

悲观派和乐观派的分歧主要是由于两者的分析方法不同。前者从静态上分析, 以理论为基础, 后者为动态分析, 结合实证从长期考虑。折中的观点表明, 因为技术创新和学习效应对降低环境成本的影响是潜在的 (Jaffe et al.,1995;Palmer et al.,1995;Walley and Whitehead,1994), 环保对竞争力的有利影响也只是潜在的。有利影响在有些企业、产业中适用, 但并非普遍现象。

2.环保措施对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

理论文献中关于环保措施对贸易影响的研究分为两种, 一种以完全竞争为基础, 一种以非完全竞争为基础。其中在两种模型中还分别讨论了大国情况和小国情况。

以完全竞争的 H—O 模型为基础, 学者们探讨了环境保护措施对要素报酬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在小国情况下, 国际市场价格是固定的。环境保护措施降低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要素报酬, 提高了清洁产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报酬, 在要素仅限于国内流动的情况下, 产业结构改变, 污染密集产业萎缩, 清洁产业扩张 (Yohe,1979;Forster,1981)。此时, 环境政策只能影响国内的经济。Krutilla(1991)的两部门模型研究了在大国中环境措施的影响。如果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 环境措施提高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 从而提高世界市场价格而改善了大国的贸易条件, 而且受贸易条件改善的驱使, 环境标准有提高的趋势。相反, 如果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 进口价格受环境措施的影响而提高, 贸易条件会恶化, 由于此时低的环境标准才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 就会引发生态倾销 (Eco-dumping)。上述结论是在资本无外流的情况下得出的。Merryfield(1988)研究了自由流动的两国模型, 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 使得国内环保措施对价格的影响有限, 从而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也较小。

在非完全竞争的模型中, 引入了政府和生产者, 并考虑竞争力是否下降。Barrett(1994)分析了包括两国政府和企业, 两国将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市场。Barrett 的结论依竞争类型和企业数量的不同而改变。当两国企业进行数量竞争时, 会形成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使得政府为了达到消费者剩余和利益最大化而制定的环境标准低于有效标准。如果是价格竞争, 则均衡环境标准会高于有效标准。

3. 环保措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实证研究方面, 由于研究方法、对象、层次的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很模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环境措施对比较优势以及竞争力有决定作用, 其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证据都不多。

Low 和 Yeats(1992)以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指标研究了环保措施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他们发现, 在 1965 到 1988 年期间, 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市场占有率下降, 而东南亚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占有率却有上升的趋势。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是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通用指标。Yeats 使用改进的

RAC 指标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变化，发现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 RCA 指数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体高于发展中国家，但随后发达国家的平均 RCA 趋于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 RCA 趋于上升。

同样，Kalt(1988)的研究也发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的这段时期内，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随着不断提高的环境标准而逐步丧失的趋势。

但另外一些研究却对环境影响的决定性提出了置疑。Tobey(1990)使用了一个多因子、多商品的 Heckscher-Ohlin-Vanek(HOV)模型，对 23 个国家 1975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发现，没有迹象表明不同的环境标准对国际贸易格局有很大的影响，贸易格局更取决于由传统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如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相似地，Sorsa(1994)考察了 1970—1990 年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发现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同样，Xu(1998)研究了 1965—1995 年的情况，他也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业方面获得了竞争优势。Jaffe(1995), Ratnayake(1998), Stevens(1993), Vallaru 和 Peterson(1997)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虽然有研究表明污染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与环境保护的提高之间具有某种相关性，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并不表明环保措施是导致竞争力下降以及出口下降的直接原因。如果把其他的因素考虑进去，这种相关性可能并不存在。世界银行研究了美国 1989 年的消除污染的费用，得出的结果是治污费用占制造业产值的比值为 0.5%，说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其他因素较之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而且，一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包括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升也许是其早期工业化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并非由环境标准的差异造成的。

四、结束语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学术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丰富得让人应接不暇。受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影响，并且在研究目的、思路和方法、数据及模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结论分歧的很大，而且不具有可比性和普适性。除了分析方法上的不统一，贸易与环境理论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还表现在：

1. 理论研究方面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特别是贸易与环保互相影响的机制上，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比较简单，得到的结论比较模糊。

2. 理论研究多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使得结论的普遍性值得怀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南北国家之间关于贸易与环保之争本来就是贸易与环保领域重要的冲突之一，单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研究不仅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可能还会产生对发展中国家有失公允的结论。

3. 数据的缺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据的缺乏削弱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可信度。而且数据可靠性的差异也使得结论变得难以确定。

虽然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但还是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一，多数学者认为贸易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是在无正确的环保政策配合的情况下，贸易会扩大市场失灵的效果而产生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扩大贸易的正效应而减少其负面效应。第二，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环境政策比贸易限制更为有效，因此我们在选择贸易措施时应格外谨慎。第三，在环境措施对贸易的影响方面，其影响的程度和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但基本上支持环保措施对贸易并非有重要影响的结论。实际上，贸易与环保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因为它们的目标都是通过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提高社会福利，这给予了协调两者关系的基础。成本内化是协调两者关系的基本手段，如果环境成本能够完全

内在化，那么贸易活动就不会带来任何环境问题。总之，将环境因素引入贸易理论，使传统贸易理论有了更大的适应范围，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国在贸易与环境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当晚，研究深度也不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发的水平还不高，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另一方面，我国的数据收集也相对困难，给我们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带来了阻碍。随着我国正式成为 WTO 的一员，对贸易和环保关系的清晰认识将对未来经济和环境政策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余群芝著：《贸易自由化与有效环境保护》[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
- [2] 兰天著：《贸易与跨国界环境污染》[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版。
- [3] 赵细康著：《环境保护力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版。
- [4] 赵玉焕：《环境与贸易协调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年 4 月。
- [5] 翟惠蓉：《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贸易与环境管理的对策思路》[D]，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年 12 月。
- [6] 宋春峰，耿献辉：“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及解决”[J]，《商业研究》，2003 年第 12 期。
- [7] Altman, M. 1997, "High Path to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J], *Challenge: the Magazine of Economic Affairs*, 41, 91-104
- [8] Anderson, K. & R. Blackhurs, 1992, "The Greening of World Trade Issues" [Z], *Harvester Wheatsheaf, New York*.
- [9] Andereoni, James; Levinson, Arik, 1998, "The Simple Analy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Z],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739*.
- [10] Antweiler, Werner; Copeland, Brian R.; Taylor, M. Scott, 2001 "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4): 877-908.
- [11] Beghin, John; Roland-Holst, David; Van der Mensbrugge, Dominique, 199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acific Basin: Coordinated Approaches to Mexican Trade and Environment Policy"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7 (3): 778-85.
- [12] Barrett, S., 1994, "A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4.
- [13] Chichilnisky, Graciela, 1994,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4): 851-74.
- [14] Cole, M. A; Rayner, A. J.; Bates, J. M., 1998,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the Uruguay Round" [J], *World Economy* 21 (3): 337-47.
- [15] Copeland, B. R. & M. S. Taylor, 1994,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755-787.
- [16] Copeland, B. R. & M. S. Taylor, 1995 "Trade and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4): 716-737.

- [17]Daly, Herman, 1993, "The Perils of Free Trade" [J], *Scientific American* 269: 24-29
- [18]Dean, Judith M., "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Harm the Environment?" [J] A New Test, CIES Policy Discussion Paper#0015, <http://www.adelaide.edu.au/cies>, 2000.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 [19] Grossman, Gene M.; Krueger, Alan B., 1993,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 in Garber, Peter M., *The Mexico-U.S. free trade agreement*,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13-56.
- [20]Globerman, Steven, 199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C], in Steven Globerman and Michael Walker (ed.) *Assessing NAFTA: A Trinational Analysis*. Vancouver: Fraser Institute, 1993.
- [21]Jaffe. A., S. Peterson, P. Portney and R. Stavins 1995,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 Manufacturi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
- [22]Kalt, J. P., 1998, "The Impact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on U.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 in M. Spence and H. A. Hazard (e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arper and Row,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23]Low. P. And A. Yeats, 1991, "Do Dirty Industries Migrate" [Z], Paper Presented to World Bank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 [24]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5]Palmer, K, W. Oates, and P. Portney, 1995, "Tighten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e Benefit-Cost or the No-Cost Paradigm?"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4): 119-132.
- [26]Pethig, Ruediger, 1997, "Pollution,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2: 160-9.
- [27]Porter. M. E. & C. van der Linde, 1995,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4).
- [28]Runge, C. Ford, 1994, *Freer trade, protected environment: Balanc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terests*[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Press, New York.
- [29]Sorsa, P., 199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Uruguay Round*[Z],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30]Tobey. J., 1994, "The Effect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Patterns of World Trade: An Empirical Test" [Z], *Working Document W94. Free University Amsterdam*.
- [31]Xu, X., 1998,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How Effective is Eco-Dumping?" Trade and Environment Workshop-papers Proceeding. [Z] Beijing, China, APEC Economic Committee.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N Min-chun, WANG Wen-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compares and reviews the existing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 including trade's effects on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ffects on trade as well as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By comparison, it indicates that trade is not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neither 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fluents trade remarkably. Actually, what bespeaks the most importance is how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y making proper policie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ntioned two.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ordinat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05-05-06;

作者简介: 韩民春, 经济学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汪文娟,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